

■ 杂俎

困惑：经济学与经济学家



◎ 张晓晖

自由撰稿人, 现居天津

随着改革进入攻坚阶段, 随着各种矛盾的暴露与尖锐化, 越来越感觉到经济学的苍白无力, 经济手段的无力与薄弱。我时常在想, 中国有没有“自己的”经济学? 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处于什么状态?

经济学包括两个层次, “道”与“术”, “道”是理论, 是学派; “术”是实践, 是措施。梳理西方经济学四百多年“道”的脉络, 非是从“看不见的手”到“看得见的手”, 再到两手并举的发展历程; 古典主义和新古典主义, 独尊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 强调自由, 反对政府干预; 而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大崩溃让凯恩斯主义走上前台, 开始重视政府干预这只“看得见的手”, 凯恩斯经济学家们都致力于政府调控的有效性研究; 而新古典综合派则把古典主义的微观体系与凯恩斯主义的宏观体系相融合, 成为今天的主流经济学派, 强调混合经济, 双管齐下, 两手都要抓, 两手都要硬。

经济学的“术”呢, 也从最初的无为而治, 变成了积极干预和调控, 政府拥有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两个工具, 厉害多了, 所以格林斯潘作为美国的“经济总统”, 威风八面。

回顾西方经济学进入中国的历程, “道”的层次上很清楚了,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市场主导加上政府调控; 但“术”的层次上却没有明显的效果。西崽儿照搬照抄, 生搬硬套, 提出的观点也是隔靴搔痒, 不着边儿。

我以为, 西方经济学不尽适用于中国, 至少有两个深层次的原因:

首先, 中国的就业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按说一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提供150万个就业机会, 但中国的农村人口作为劳动力供给却是无限庞大的, 一年9%的增长, 农村出

来一千万民工, 就抵消掉7个百分点。所以, 靠经济增长来实现充分就业几乎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 由于劳动力供给的无限庞大, 劳动力价格非常低, 换句话说, 人命不值钱, 所以有了矿井下带血的GDP, 多数人感觉不到自己收入的增加, 就是因为不断进入市场的劳动力摊薄了收入。这一点可能很残酷, 但我们不得不承认。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市场机制不完善, 导致市场传导机制不畅通, 表现为“油门”有效, “刹车”无效, 财政政策效果大, 货币政策效果小。比如, 积极的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发展, 发国债搞基础设施建设, 各级政府花钱的积极性都很高, 火烧眉毛时, 拍胸脯定项目, 突击要钱, 突击花钱, GDP一下子就起来了; 但紧缩性调控时, 货币政策几乎是杯水车薪, 两年前利息、准备金率都降不了温, 不得已动用行政手段, “江苏铁本”, 杀一儆百, 才算勉强刹住了车。为什么呢? 因为有些贷款者连本都没打算还, 加息不加息就更不在乎, 而中国又缺乏破产机制, 欠银行多少钱, 也没见银行抄了哪家的家产。银行、国企、地方政府都是国家的, 谁破产的产?

相比之下, 股市倒是真打实的, 资金链一断, 股价倒栽葱一样向下摔, 随后东窗事发, 层层黑幕露出冰山一角, 接着或身陷囹圄, 或捐款而逃, 逍遥法外甚至逍遥国外。

现在, 房价越走越高, 据说是开发商“囤房”, 抛开土地给地方政府带来的收入和寻租机会不谈, 房地产业很小比例的自有资金, 为什么还敢“囤房”? 银行又起了什么作用? 这种作用莫非还要等哪家企业崩盘的时候才让真相大白于天下?

可见, 西方经济学还不尽适用于中国, 要把西方经济学的普遍原理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那么首先要有独立的经济分析, 要有踏踏实实、不赶风头去执研究的经济学家。

温总理曾谈及“穷人的经济学”, 遗憾的是, 现在我们不仅没有穷人的经济学, 甚至没有独立的经济分析。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困惑, 也是经济学家的困惑。

■ 亲历 老证券人的回忆之十五

消息啊, 消息



◎ 应健中

上海作家协会会员, 曾任教师、律师、编辑、证券公司高管

今天沪深股市的上市公司信息发布已发展到极其先进的程度, 平面媒体的发展不仅为投资者提供信息, 还为投资者提供了丰富的资讯, 而网络的兴盛又为投资者提供了最佳的技术手段。回想十多年前, 投资人想要获取资讯还真不易啊, 有些细节现在简直可以拿来当笑话讲了。

上交所成立之前, 买卖股票主要通过柜台交易, 那时还没有专业的证券媒体。现在的股民怎么都想不到当年在上海西康路101号的“静安证券营业部”挂牌, 将事实呈现在公众和政府面前, 呼唤社会对下一代负责, 一起改变不健康的饮食。家长们举手欢迎, 但不希望增加经济负担。学校当然不开心, 自辩道, 孩子们就喜欢“垃圾”食品, 不愿吃新鲜蔬菜, 而且经费、人力有限, 学校不可能提供现做的新鲜午餐。激愤之下, 这位大厨将饭店业务暂丢一边, 花了几个月时间亲自下到几间学校厨房, 示范、教导如何以有限的开支做健康的午餐。虽说他是一位大明星, 但因挑战了根深蒂固的体制和习俗, 遭受的波折、困难可想而知, 还差点没将婚姻家庭搞上。精疲力尽的他使出最后一招: 收集了二十几万人签名的上书去唐宁街10号见首相布莱尔, 要求政府追加学校午餐津贴。布莱尔当即对他拍肩支持, 承诺实际行动后来跟上。几个月后, 英国教育部果然宣布, 三年内追加280万英镑的学校午餐津贴, 并加速制定学校健康午餐标准。那段时间, 整个英国服务行业(有人可能还会另给小费), 一顿饭下来费用不菲。

那么英国人的日常饮食又是如何? 调查显示, 英国人均消费的垃圾食品数量占欧洲之首。这里的垃圾食品指的是, 炸薯条



务虚之谈

梅西教授的中国缘



◎ 周洛华

国泰君安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并购部副总经理 上海大学金融系副教授

约瑟夫·梅西(Joseph A. Massey)教授又来中国了, 这次是作为独立的学术机构负责人来评估中美贸易关系是否对美国有利。我初次见到这位跟中国很有缘的教授, 是刚到Dartmouth学院Tuck商学院报到的第一天。他先是非常热情地询问了我的情况, 然后说对我的研究很感兴趣, 希望我下周有时间与他深入交谈。可不知怎么我再去拜访他的时候, 他却忘记了我的名字, 也不记得曾经和我约定的深谈。

以后每次遇见, 他总是已经忘了我的名字, 但他马上会毫不在意地拉着雪白的络腮胡子说: 我每长出一根白胡子, 就会忘记一个人的名字。而最近我又老了许多, 不巧把我的名字忘了。他懂得中国人倚老卖老的办法。

长得很像肖恩·康纳利的梅西教授是Tuck商学院亚洲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也是老布什政府时期中美贸易谈判的美方代表。虽然从谈判桌前退休已久, 却仍然有一双犀利的目光审视着对手, 目光中流露出丝丝令人不安的狡黠。而学生们都很喜欢他的课, 喜欢听他讲在遥远的亚洲冒险的往事。

他是个典型的注重实力和务实的共和党人。他曾经对我说, 他现在到了最忧虑的时候, 因为两个女儿到了开始恋爱的年龄。他对刚满18岁和16岁的两个女儿说, 孩子们, 爱情这个词是这样拼写的: “R-I-C-H, Love”(RICH是富裕的意思)。我希望你们都嫁给有钱的丈夫, 这样他们才有可能像我一样爱你们。在他眼里, 整个世界都是靠实力在说话的, 没有实力的男孩不要来约我女儿, 没有实力的谈判对手在我面前不许提出任何条件。

梅西曾经回忆起代表华盛顿和中国开展人世谈判的经历。那是1988年到1992年期间, 他记得对手的名字Madam Wuyi(吴仪女士)。他把她称为“A worthy competitor”(一个值得的对手)。他夸耀说, 当时的中国政府是在他的要求下才通过了“知识产权保护法”。他直言, 从短期看, 这是他为美国企业界做的一件有利的事; 而从长期看, 这是他对中国了不起的贡献。因为盗版猖獗最终会阻碍一个国家的进步。他那时对吴仪说, 美国曾经是19世纪最大的盗版国, 总是偷印英国人的书, 狄更斯和他的出版商恨透了。但是我们最终发现要保护好知识产权, 这样才会在20世纪强大起来。中国只有在现在保护好美国的知识产权, 才能在将来产生超过美国的知识产权。这是他的强国逻辑。

其实梅西教授是一个热爱中国的人, 他十多年前随着老布什下台而黯然离开政界, 投身学术界。他积极宣传中国, 告诉他的学生们: 到中国去, 那里才是决定未来你们公司成败的关键。当时他的声音是微弱的, 并没有多少人相信他的预测。我后来在上海遇见一位校友, 他代表法国公司来华投资, 我们俩一起在花园饭店接待了梅西教授。法国同学兴奋地回忆起当年听梅西讲述亚洲机遇的事情: “教授, 我这下真的来了。”那次梅西教授刚刚带领一队MBA学生来亚洲实习, 他接到了尼泊尔政府的委托, 组织学生为该国规划旅游项目(他在美国政府任职期间, 曾经向尼泊尔政府提供过援助)。他很自豪地说, 现在他组织的团队报名人数最多。因为大家越来越意识到亚洲的重要性了。

梅西曾经对我说过: 洛华, 千万不要去学术界浪费你的才

华, 要在企业界发展。他总是鼓励中国学生回国工作。他对我说, 你应该回去当中国的财政部副部长。(读者千万不要以为我有如何的能耐, 事实上梅西给我每一个中国留学生都“安排”了一个至少是副部长的头衔。)他说这样对你们自己, 你们国家, 还有对美国都是有利的。他念念不忘的是捍卫美国的利益。

中国人世时, 他很高兴, 尽管他说当时他的要价太高, 因而没有和中国达成协议。民主党的谈判代表降低了对中国的一些要求, 所以和中国达成协议。这对美国企业是不利的, 从长远来看, 对中国企业也是不利的等等。不过他也承认时代不同了, 那些要价在十几年前, 他还有机会向中国提出, 而后来的“民主党”谈判代表已经面对一个经济上更强大的中国, 因而不能提出这些要来了。他始终认为自己是

对的。他卸任以后曾经担任过上海市长的国际咨询顾问, 当时每年来上海开会。他耿耿于怀的是, 中国人现在都在谈论那个和他们达成协议的女谈判代表, 而他的“贡献”似乎也渐渐被遗忘了。

梅西说他是中国的朋友, 他了解中国人的自尊心、荣誉感、民族心理、思维方式、礼仪和信仰。过去他是为了工作而主动地去了解有关中国的信息, 而当他自己了解了这一切之后, 就开始热爱这个国家, 当然是用他的方式。

梅西教授和他的中国故事从另一个侧面记录了中国国际地位的上升。就在我们将赢得更多尊敬的时候, 不应该忘记他曾经作为美国利益的捍卫者, 百般刁难我们加入WTO。我们自己越强大, 就越能够宽容地理解他的动机, 就越能够正面的看待他对中国的贡献, 也就越应该记得这样的朋友。

“万人迷”厨师大战“垃圾食品”——英伦手记之三



◎ 陈丹红

自由撰稿人, 旅居美、英10余年

法国朋友听说我们要搬到英国, 说了一句: 英国吃的很“乏味”(Boring)。

的确, 以土豆、面包为当家的传统英国饮食相当单调。在一家标榜“英国乡村饮食”餐馆里点到的主食是烤土豆、煎香肠或炸鱼排。配菜是一大堆水煮的土豆、红萝卜、青豆、花椰菜。调料是靠自己往上撒的奶油、盐和胡椒粉。

或许正因为英国传统饮食的式微, 引得外来者趁虚而入。伦敦以外的中小城镇, 除了Café 饮食店(主要售卖三明治、汉堡包等简易饮食)外, 最普遍的餐馆(Restaurant)基本上由中餐、意大利餐、泰国餐、印度餐等外来饮食占上风, 而外卖店的中餐、土耳其烤肉汉堡包(Kebab)本土的“炸鱼排”(Fish & Chips)更受宠。年前, 伦敦出人意外地被美国大报章推作“世界美食城”的榜首, 正是因为它从数量到风味的多样化、国际化。

对许多普通英国人来说, 外出就餐是一种偶尔享受的奢侈。英国缺乏亚洲国家那种物美价廉的路边小摊、小吃店, 而食阁只在为数不多的大型购物中心才能见到(通常不开晚餐)。因此, 外出晚餐的选择只有餐馆。中等西餐馆里的一道主菜少至十几英镑, 多则三十磅以上(1英镑约合15元人民币)。同样档次的中餐或亚洲餐馆的一道主菜约八、九磅以上, 相对经济实惠些。但结账时, 加上昂贵的酒水钱以及约17%的伙食税、服务费(有人可能还会另给小费), 一顿饭下来费用不菲。

那么英国人的日常饮食又是如何? 调查显示, 英国人均消费的垃圾食品数量占欧洲之首。这里的垃圾食品指的是, 炸薯条

■ 大局

当代中国的发展颠覆了“传统智慧”

——冷说“国学热”



◎ 周兴镇

西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眼下中国正兴起一股国学热。一些重点大学开办国学班、国学学院, 着手培养国学硕士、博士乃至国学大师, 还与电信联手开通“国学短信”, 看样子, 国学复兴之势大焉。但有人说, 现在一些弄国学的人自己并没有国学素养, 更没有国学资本, 何以复兴国学? 还有人说, 现在的国学是资本国学即被金钱包装的国学, 比如, 收费不菲的国学高管班(国学EMBA)除了附庸风雅, 就是炒家对国学的糟蹋、作践。

不过在我看来, 无论国学资本还是资本国学, 实际上都不会是问题——只要他是自诩自说、自钱自花, 就怕他误入歧途甚至走火入魔。我以为国学热背后真正值得警惕的隐忧有两个: 一是“拉大旗作虎皮”的特权国学, 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二是“王者师卫道士”的国学特权, 开启启蒙诱导后生贻误青年。归结起来, 这两个隐忧, 险在可能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成果, 险在可能导致与社会主义民主法治格格不入的所谓新权威主义的“人治”“仁政”。

就现实而言, 随着物质财富的空前丰富, 人们的利益关系日趋复杂, 科层组织也愈加精巧, 官僚队伍更见庞大, 事实上已经出现了一种忽视“人的存在”的危险趋向。简单地说, 就是今日用“丛林法则”武装起来的“新儒家精英”们(其中

热保持一份警惕。“学得文武艺, 卖与帝王家”。国学当然可以引致官富士裕, 但却不能导致民殷国富。典型的例子是宋——一方面是“理学”发达, 朝廷富裕, 但另一方面有宋一朝却是华夏历史上最为羸弱的王朝。的确, 国学体系庞大卷帙浩繁, 其间良莠杂陈精华糟粕相间, 不乏一些求学求知者做事立言立德的道理, 但其内圣外王的大道理才是要害——民心有君民心重, 君心有民君心轻。无论三坟五典九丘八索还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 说白了, 国学的主体精神就是帝王术、人治术、心道术, 其核心旨趣始终都是维护皇权专制的。这与善民的人们所希望的国人之学、国民之学、国家之学岂非南辕北辙?

自秦以降特别是西汉“独尊儒术”以来, 两千多年的传统中国就一直被“国学”所主宰, 其治理中国社会的最终成果, 按毛泽东的话说, 到底也不出“一穷二白”——例如, 直到1949年, 全中国的钢铁产量也还不到百万吨。仅此一个最直观也最简单的史实, 足见国学主体在治理国家和社会上的无力。

毋庸讳言, 近二三十年来, 伴随经济的高涨和社会环境的宽松, 不仅历史上积压的各种老问题充分暴露了出来, 而且发展中产生的种种新问题也日益紧迫了起来。但无论如何, 新中国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成果并未付诸东流; 而如果非要说依靠了什么, 我想, 除了民众的辛劳、因素恐怕就只有两条: 法意、人性, 也即我们今天普遍倡导的社会主义法治和民主。

如果说当代中国的发展已经颠覆了大部分传统中国的“传统智慧”(加尔布雷思发明了“传统智慧”的术语, 指那些无切实证据证明、却因精英人士和权威人士鼓吹而成为所谓社会共识的观点及信息)的话, 中国的下一步发展究竟还有哪些可以寄望“传统智慧”的呢? 这是面对国学热, 我们不能不思考的问题。